

文在寅時期韓日關係發展對美日韓安全合作之影響與展望—以韓國觀點為中心

空軍中校 馬依翔

提 要

韓日兩國長期存在歷史與現實戰略利益上的矛盾及懸而未決之問題，導致兩國關係即使在美國積極搓合下仍相敬如冰。相較於朴槿惠總統任內從未訪日之情況，文在寅政府時期，韓日關係衝突更加具體化，包括：文在寅反對朴槿惠政府與安倍政府達成的「韓日慰安婦協議」；日本不滿韓國對日企二戰徵用工賠償判決所發動的貿易戰；韓國海軍及日本海上自衛隊間的火控雷達爭端；延續「韓日軍事情報保護協定」與否的爭議；獨島(日稱「竹島」)領土主權爭議；以及兩國近年的外交、國防政策白皮書對對方的關係描述之爭論等。

韓日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的安全合作夥伴，美國在應對中國崛起後急欲提升區域霸權地位之挑戰，以及北韓追求核擁有國地位之安全威脅等棘手問題上，深化美日韓的東亞安全合作領域是不二手段。但韓日關係的持續惡化，對於韓美、韓日同盟在應對北韓核威脅的整合與協作，以及遏制中國勢力東擴的印太戰略等，均將成為相關安全合作機制發展的阻礙因素。

本文將從韓國的觀點與國家利益出發，探討韓日關係持續惡化對美日韓同盟在應對朝核問題及推動印太戰略與四方會談之影響，並探究韓國對於日本進行東亞安全合作之意願與考量因素。

關鍵詞：韓日關係、美日韓同盟、美日韓安全合作、印太戰略

前 言

2010年以後，韓日關係比起合作，矛盾更加突出，在獨島主權、歷史懸案等問題之摩擦更進一步激化。特別是在文在寅及安倍時期，兩國政治矛盾更加明顯，軍事緊張度高升，雙方因歷史懸案而互祭經濟制裁措施撼動國際半導體產業，也引起人們對於美日韓安保合作可行性之

關注。韓國國內因而認為韓日關係難以改善的懷疑論占據了主要地位，日本國內對韓國之負面觀感更加深化，然兩國卻是美國在東亞最重要之安保與經濟合作盟友，肩負著美國圍堵中國及北韓的戰略前沿角色，兩國關係的惡化，勢將對美國在東亞地區安保戰略部署產生結構性的重大影響。因此，本文將試圖以同盟理論為基底，解構影響韓日關係發展的重大事件，

探討兩國國家安全觀差異，並進而為分析兩國關係發展對美國在東亞推動美日韓安保合作之影響。

同盟理論

一、同盟的定義

同盟(alliance)是指多個國家共同聯合，為達到特定目標而採取一致性與相互協調性之行動。多數同盟國間通常會簽訂盟約為證，當事國所關切的問題不外乎是共同威脅與相關國際安全議題。對於同盟概念的界定，原則上有四項共識¹：(1)同盟成員國是兩個或者兩個以上的明確主權國家。(2)成員國必須面對來自外部的共同威脅，此威脅可能是客觀存在，亦可能是一種假想，此為同盟存在的共同利益基礎。(3)成員國之間必須具有明確的意思表示，或者具有明確彼此權利和義務的盟約，或者具有默契的非正式安排。(4)成員國在面對威脅時能做出共同行動，具有協調行動的選擇性激勵或懲罰性措施。此四項條件是同盟得以成立的必備條件。

然而，同盟的定義並非相當明確，兩個同盟國間亦常存在利益矛盾與相互鬥爭的情況²，如1960年代的中蘇矛盾，當前的美日、美韓同盟架構下的韓日關係衝

突亦同。

二、同盟成因

對現實主義學派而言，國際體系是處於無政府狀態，國家是一致且理性的行為者，而「權力」是國際關係中的核心概念。古典現實主義代表人物摩根索將權力定義為國家執行外交政策的有形與無形力量，有形力量包括一切可量化的指標，如人口、領土面積、自然資源、軍事準備、經濟程度等；無形力量則包括民心士氣、領袖能力等。摩根索闡明國家運用權力追求利益，國家有追求利益的永恆性且合乎國家的道德，而國家利益是由戰略與經濟能力所組成，是決策者追求的單一目標。古典現實主義者強調國家利益超過對普世道德的維護，進而引導出國際政治被視為權力鬥爭場所的必然結果。³

由於國際體系為無政府狀態，想要阻止其他國家行使權力，最可靠的方式即是凝聚足以與之抗衡的力量。此時，結盟行為在權力平衡體系中就扮演非常重要的角色。⁴摩根索認為，同盟與勢力均衡二者密不可分。在多國體系中，互相競爭的A國和B國為確保或改善它們相對的權力地位，可作出三種選擇：(1)增加自己的權力；(2)將其他國家的權力添附在自

1 趙可金，〈軍事同盟及其生命力問題〉，《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4期，頁84。

2 Jon C Pevehouse・Joshua S. Goldstein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四版)》(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E)(臺北：雙葉書廊，2017年)，頁58。

3 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年)，頁47-51。

4 Jon C Pevehouse・Joshua S. Goldstein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四版)》(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E)(臺北：雙葉書廊，2017年)，頁47。

己的權力上；(3)阻止其他國家的權力添附到對手的權力上。當它們作出第一種選擇時，會進行軍備競賽，當它們作出第二和第三種選擇時，便執行同盟政策。一國是否採取同盟政策不是一個原則問題，而是權宜之計。⁵然而，對於小國而言，同盟是最重要的權力要素，小國經迫隨於強國，成為「扈從國家」(client state)，敵國受到強國威脅不得攻擊扈從之小國，此情形即稱為「延展性嚇阻」。⁶不過，新古典現實主義學派主張略有不同，新古典現實主義調整結構現實主義賦予國家企圖與動機的不變性，而提出「滿足現狀」與不滿足現狀的「修正主義」的補充概念。「滿足現狀」通常傾向接受當下國際秩序與權力分配，權力平衡為其維護現存秩序的政策；不滿足現狀的「修正主義」則傾向於挑戰或改變當下的國際秩序，並認為扈從(bandwagon)強者與之結盟，均為弱者企圖維持現狀或改變現狀的有效選項。此種詮釋促使同盟的意涵不再僅止於權力平衡的單一目的。⁷

結構現實主義學派肯尼士·華爾茲(Kenneth N.Waltz)的見解與摩根索「權力

即是利益」的主張不同，他將制衡定義為「與權力較弱的一方結盟」，將迫隨定義為「與權力較強的一方結盟」，並認為權力只是手段，安全才是目的。⁸沃爾特(Stephen M. Walt)根據華爾茲的結論提出「威脅平衡論」(Balance of Threat)，認同安全是第一要務，且權力並非唯一要素，制衡的物件是威脅，而非權力。因此，國家往往會對最有威脅的而非實力最強的國家作出反應，因為權力並不同於威脅，威脅也不一定來自權力最大的國家。歷史上曾出現一個國家會同時與相互敵對的兩個政權結盟以維持自身安全的「雙面同盟」，古代朝鮮半島的高麗王朝和李氏王朝便採用「雙面結盟」維繫與中國及北方少數民族政權的關係，與中國政權結盟可以滿足其國內統治階級存在的合法性，而與北方游牧民族政權結盟則可以保證國家的生存安全。但「雙面同盟」內在的結構性矛盾導致無法長久穩定，該國家將不斷引發兩邊盟友的猜忌與不滿。⁹因此，在「威脅平衡」理論中，國家並不在乎聯盟者的政治意識形態為何，只在乎可否尋求一個比迫切威脅者更大的力量，以應對該

5 于鐵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理論：進展與爭論〉，《歐洲研究》，1999年第5期，頁16-17。

6 Jon C Pevehouse・Joshua S. Goldstein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四版)》(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E)(臺北：雙葉書廊，2017年)，頁58。

7 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年)，頁56。

8 尚書，《美日關係同盟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年)，頁16。

9 戴正、鄭先武，〈同盟理論的演進過程—兼論其對中國國際關係理念的鏡鑒作用〉，《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jgxx/gj_gjgxll/202002/t20200217_5089275.shtml〉。

迫切的威脅，獲取國家安全。¹⁰

三、同盟困境

「利益一致性」是同盟得以維持的根本要素，一旦各方在共同利益上出現認知偏差，同盟即可能發生動搖。¹¹葛倫·施奈德(Glenn H. Snyder)提出「同盟困境」理論，他借用了邁克爾·曼德爾鮑姆(Michael Mandelbaum)「拋棄」(abandonment)和「牽連」(entrapment)兩個概念。「拋棄」有如盟國解除盟約或與敵國結盟，而「牽連」則意味著因盟國的利益而被捲入一場衝突，而已國對該利益卻不能共用或僅能部分共用。「同盟困境」意義有二：(1)國家在「拋棄」和「牽連」之間的權衡——一個想「表忠心」的國家會更容易被其盟國拖進一場它不希望或者不必然發生的戰爭中去。反之，一個擔心遭受「牽連」而打算與盟國拉開距離的國家又要冒被盟國拋棄的風險。(2)一國如果為避免被拋棄而選擇強化同盟，那便有可能引發對手的敵意，加劇緊張局勢；而一國如選擇弱化同盟，則又可能促使那些抱有擴張主義目標的對手得寸進尺。葛倫·施奈德還比較了兩極和多極狀態下「同盟困境」的差異。他指出，由於

在兩極體系下，被盟國「拋棄」的風險要比多極體系下小得多，所以「同盟困境」的情況不那麼嚴重，在處理與敵國的關係時，盟國之間可以奉行獨立、甚至互相矛盾的政策，而不擔心會因之被夥伴拋棄。¹²

中國學者在「同盟困境」概念的基礎上提出「新同盟困境」理論，「新同盟困境」是建立在同盟的對手與同盟成員經濟聯繫密切性的基礎上。若同盟成員與同盟對手的經濟聯繫十分緊密，將會出現某一盟國與同盟對手收益共損的現象，即因為安全上的對抗而導致經濟上的損失。同盟存在的基礎之一是有共同的對手，若同盟成員國與對手之間來往甚密，雙方的敵意就會不斷減少，若敵意無限縮小並趨於消失，那麼同盟也就失去了其存在的意義。若成員國為了維護同盟存在的基礎而不斷地強化與對手的敵意，那麼它們與對手之間的經濟關係必定會受到衝擊，並且，倘若經濟聯繫十分緊密，造成的損失將非常巨大。因此，成員國必須考慮是否值得以高昂的經濟損失為代價去維護同盟的團結。¹³

10 林宗達，《國際關係理論概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相關理論(二版)》(臺北：經典文化，2016年)，頁173。

11 戴正、鄭先武，〈同盟理論的演進過程-兼論其對中國國際關係理念的鏡鑒作用〉，《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jgxx/gj_gjgxl/202002/t20200217_5089275.shtml〉。

12 于鐵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理論：進展與爭論〉，《歐洲研究》，1999年第5期，頁18-19。

13 戴正、鄭先武，〈同盟理論的演進過程-兼論其對中國國際關係理念的鏡鑒作用〉，《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jgxx/gj_gjgxl/202002/t20200217_5089275.shtml〉。

韓日關係爭端近期發展

一、日軍「慰安婦」問題

2015年12月28日年韓國朴槿惠政府與日本安倍政府就日軍慰安婦談判達成妥協，並承諾終局性的結束慰安婦問題，該協議一般稱為「12.28協議」。而日相安倍晉三在河野談話中表示，「透過進一步的內容和書面形式，以首相身分向慰安婦受害者表示歉意和反省。」¹⁴

韓日雙方就協議內容發表公開聲明如下¹⁵：

(一)日方：

1.慰安婦問題是在當時軍隊的參與下，對多數女性的名譽和尊嚴造成嚴重傷害的問題，日本政府痛感責任。安倍內閣總理大臣再次對作為慰安婦所經歷之痛苦，身心受到難以治癒傷害之所有人表示由衷的歉意和反省之心。

2.韓國政府決定設立以支援前慰安婦為目的之基金會，日本政府將一次性提供資金，日韓兩國政府共同致力恢復前慰安婦人的名譽和尊嚴及治癒心靈創傷之事業。

3.日本政府在表明上述內容的同時，以確實實施上述措施為前提，通過此次發

表確認本問題將最終和不可逆轉地得到解決。另外，日韓政府今後在聯合國等國際社會上將會克制相互指責、批評本問題。

(二)韓方：

1.以日本政府確實實施上述措施為前提，通過此次發表確認將與日本政府共同、最終和不可逆轉地解決該問題。韓國政府將協助日本政府實施的措施。

2.韓國政府認識到日本政府從「公館安寧」、「維持威嚴」的角度出發，對駐韓日本大使館前的少女像表示擔憂，並努力通過韓國政府，及與相關團體協商，尋求妥善解決的可能應對方向。

3.韓國政府以此次日本政府表明的措施切實實施為前提，與日本政府一起克制今後在聯合國等國際社會上對該問題的相互指責和批評。

然而，2015年1月18日，日相安倍卻在參議院表示，日、韓達成慰安婦協議，並不代表日本承認慰安婦制度為戰爭犯罪，安倍堅稱在政府的軍方及官方資料上，查無強徵慰安婦的具體證據，日本對於慰安婦的立場並無改變¹⁶。文在寅政府時期，為調查朴槿惠政府與日本政府達成「12.28協議」之真相，遂於外交部長官轄下成立直屬「韓日慰安婦受害者問題協

14 이재훈, 〈한·일, 위안부문제해결합의... “군관여여성에게상처”〉, 《한겨레》, 2015년 12월 28일, 〈<https://www.hani.co.kr/arti/politics/diplomacy/723743.html>〉.

15 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 문제합의 검토 태스크포스, 《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문제합의(2015.12. 28.) 검토결과보고서》, 2017년 12월 27일, P.11-21.

16 何思慎, 〈日、韓「慰安婦問題」中的外交、歷史與人道〉, 《海峽評論》, 2016年2月號(302期), 〈<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7783.html>〉

議評估特別工作小組」(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 피해자 문제합의 검토 태스크포스, 以下簡稱TF)。根據該小組於2017年7月27日公布調查結果報告中顯示,「12.28協議」除包括外交部長聯合記者招待會發表的內容以外,尚存在非公開的部分¹⁷。

TF報告內容指出¹⁸,非公開提及的內容尚包括說服韓國慰安婦問題對策協議會等受害者相關團體、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少女像、第三國紀念碑、「性奴隸」用語等敏感問題。日方表示,根據此次發表,慰安婦問題將最終和不可逆地得到解決,希望韓國政府主動說服韓國慰安婦問題對策協議會。另具體詢問韓國政府將日本駐韓大使館前的少女像遷移的具體計劃,盼韓國政府承諾不再對設置海外慰安婦少女像、紀念碑提供支援,同時並希望韓國政府今後不要使用「性奴隸」一詞。

對於日方的要求,韓方表示將努力設法說服「相關團體」,設法移除日本駐韓大使館外的慰安婦少女像,但海外慰安婦少女像及紀念碑屬民間自發行為,非韓國政府所能干預,至於不再在使用「性奴隸」一詞的要求,韓方雖未明示承諾,但在非公開部分確認了政府使用的正式名稱

只有「日軍慰安婦受害者問題」,意味著接受了日方的要求。TF報告另指出,雖然韓國政府非公開提及的內容中並未有少女像移除、不參與設立第三國紀念碑或不使用「性奴隸(sexual slavery)」等承諾,但卻為日本方面留下了介入這些問題的餘地。

在TF報告公布後,文在寅總統表示「12.28協議」在程序和內容方面存在「重大缺陷」,且違反國際社會的普遍原則,故該協議無法解決慰安婦問題。¹⁹文在寅總統指示,在「以受害者為中心和國民一起外交解決,政府將儘快制定後續措施」的原則下,2018年1月9日,外交部長官康京和發表文在寅政府關於「12.28協議」的基本方針,核心內容如下²⁰:

1.由於日本政府主張「12.28協議」不能重新再協商,故韓方不會要求重新協商,韓國政府將致力恢復受害者的名譽和尊嚴及治癒心靈創傷,而受害者們希望的是日本方面的「主動、真正的道歉」。

2.日本政府所提供的慰安婦援助基金10億日圓將由韓國政府預算充當,對於10億日圓的處理,將與日本政府進行協商。另外,為支援受害者而設立的和解治癒財

17 조준형, 〈박근혜정부 '위안부이면합의' 숨졌다... "합의비공개부분존재"〉, 《연합뉴스》, 2017년12월27일,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71227088400014>〉

18 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 문제합의 검토 태스크포스, 《한·일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문제합의(2015.12. 28.) 검토결과보고서》, 2017년12월27일, P.21-25.

19 문재인, 〈위안부 TF 조사결과에대통령입장문〉, 《청와대》, 2017년12월28일, 〈<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915>〉。

20 조진구, 〈문재인정부의대일정책-일본군위안부문제를중심으로〉, 《한일민족문제연구》, 36권0호, 2019년 06월, P.184-185.



團的解散處理，將收集受害者和相關團體等的意見後決定。

3.將韓日間的歷史問題和面向未來的合作問題將採取分開處理的「雙軌制」方針。

4.「12.28協議」沒有如實反映受害當事人的意願，並無法真正的解決問題。

此外，日本文部科學省於近日通過教科書出版社的申請，在教科書中以「慰安婦」代替「從軍慰安婦」一詞，並將「強制帶走」一詞修改為「強制動員」或「徵用」的用詞。韓國外交部於2021年9月10日表達抗議與遺憾之意²¹。朴槿惠政府與日方達成的「12.28協議」遭到代表進步派的文在寅政府否決，從未平息的日軍慰安婦問題再度成為韓日紛爭焦點。

二、獨島主權爭議

獨島(日本稱「竹島」)問題是韓日間由來已久的領土爭議問題。1952年4月28日生效之《舊金山對日和平條約》第二條(a)規定，日本承認韓國獨立並放棄其對韓國，包括濟州島、巨文島與鬱陵島之一切權利、名義與要求，但嗣後韓日兩國對於本條約涉及獨島主權問題之爭議，多

圍繞在獨島是否被包含在本條約的範圍內。1952年1月18日，韓國總統李承晚宣佈毗連海域主權聲明，將獨島劃入領土範圍內，日本於1月28日對於「李承晚領海線」宣言提出抗議，兩國領土紛爭自此爆發。²²1953年5月，在韓戰期間，日本曾派兵一度占領獨島，但被韓國鬱陵島居民組成的「獨島義勇守備隊」驅離，隨後韓國於1981年在島上興建直升機場，1993年興建燈塔，更在2012年8月19日李明博總統登上獨島，成為南韓歷史上第一位登上獨島的總統後，高達76.6%的韓國MZ世代²³在2013年認為獨島問題是韓日關係惡化最大的關鍵，也是韓日領袖會談最應優先處理的議題²⁴。

面對韓國對獨島主權伸張之國家措施，日本亦曾多次派遣海上保安廳巡邏船前赴獨島海域巡視及探勘周邊水域，多次建議將獨島問題提交國際法庭裁決，但韓國認為獨島問題事關主權，不容外界裁判為由予以拒絕。另在2019年8月31日韓日貿易戰情況下，韓國在獨島擴大軍演，韓國朝野多黨議員團在當日中午登島，日本外務省則向韓國外交部表達強烈抗議²⁵，

21 손덕호, 〈日 교과서, ‘중군위안부’ → ‘위안부’ 수정...외교부 “매우유감”〉, 《조선일보》, 2021년 9월 10일, 〈<https://biz.chosun.com/policy/politics/2021/09/10/6FOKONQWK5FKVNPQ72E5OGLTYQ/>〉

22 陳剛華, 〈韓日獨島(竹島)之爭與美國的關係〉, 《學術探索》, 2008年第4期, 頁41-43。

23 MZ世代指的是1980到2000年代初期，出生的千禧(Millennials)和Z世代，亦即18到40歲的年輕人，他們關注公共議題，比起理念更重視「實際利益」。參見何映萱, 〈MZ世代！南韓企業社內課向年輕人取經〉, 《TVBS新聞網》, 2021年5月7日, 〈https://news.tvbs.com.tw/focus/1505442?from=Copy_content〉

24 윤석정, 〈청년세대(MZ세대)와 일본군 ‘위안부’ 문제〉, 《[EAI 위킹페이퍼] 한일관계세대분석_역사》, 2020년 8월 11일, P.4-5.

25 觀察者網, 〈韓國6名議員登爭議島嶼日政府：極為遺憾〉, 《新浪新聞》, 2019年8月31日, 〈<https://news.sina.com.cn/o/2019-08-31/doc-iicezueu2485369.shtml>〉。

兩國關係急速惡化。

三、韓國強制徵用工判決爭端與日韓間的報復性措施

1939年至1945年，日本帝國主義末期在朝鮮半島地區內實施侵略戰爭強制動員。當時，被帶到日本國內的煤礦或工廠，因強制勞動而遭受痛苦或死亡的韓國人多達105萬人。2018年10月，韓國大法院在「新日鐵住金(現日本製鐵)」和11月「三菱重工業」訴訟中做出了日本企業分別向受害者賠償1億韓元的最終判決。根據2018年10月大法院的判決書，1965年簽署的《韓日請求權協定》並未規定解決受害人權利，而是認為韓日之間領土分離引發的債權、債務關係解除。因此，對於在日本帝國主義非法佔領下進行侵略戰爭的過程中發生的反人道主義犯罪所造成的強制動員損失，日本企業決定各賠償1億韓元精神損失費²⁶。對此，日本政府則以韓國政府違反1965年簽署的《韓日基本條約》²⁷和2015年《慰安婦協議》為由，要求韓國政府提出解決方案，並在2019年7月1日限制出口氟聚醯亞胺

(fluorine polyimide)、光阻劑(resists)及氟化氫(hydrogen fluoride)等3種半導體、顯示器核心原物料出口韓國之措施。另日本認為文在寅政府與北韓友好，且近年韓國又發生156件戰略物資流入北韓、伊朗、敘利亞等事件，故日相安倍在2019年7月7日表示無法信任韓國，暗指相關的原料可能流到北韓，成為軍事用途，故必須要進行較嚴格的限制。但韓方認為，此僅是日方的片面說詞，否認相關原料曾輾轉流到北韓。²⁸

2019年8月2日，日本以韓日之間損害信任導致安保問題為由，將韓國從「出口貿易管理令附表第三國家群(白色國家名單)」中排除，此舉激化韓國民眾反日情緒，最終引發「抵制日本運動(Boycott Japan)」。²⁸韓國政府遂以日本違反國際自由貿易為由，向世界貿易組織(WTO)提出告訴，並訴請美國川普政府積極斡旋，且提出針對日本經濟制裁的應對方案，將日本從「白色國家」名單中除名，同時認為與日本交流安保敏感軍事情報不符合國家利益，決定終止《韓日軍事

26 양기호, 〈강제징용 문제와 한일관계: 타협의 돌파구는 없는가〉, 《정책논쟁》, 제144호, 2020년8월11일, P.1-2.

27 1945年終戰後，日韓未能建立正式外交關係，直至1961年，時任韓國總統朴正熙訪日展開會談。當時日本政府計劃針對韓籍日本兵與徵用工薪資等議題，進行個人賠償，作為兩國建立外交關係的誠意。日方計畫賠償每人200美金，總額為3億6千萬美金(約合現在的48億美金、5,184億日幣、1,440億台幣)。不過朴正熙在與當時的首相池田勇人會晤時，卻表示日本如果在「財產請求權」上表現誠意，韓國將不再向日本要求賠償，雙方經過磋商後，在1965年簽訂「日韓請求權與經濟協力協定」，明文日本將對韓國提供3億3千萬美金的無償經濟援助，與2億美金的低利貸款，而韓國也將不再向日本進行請求權賠償，隨後兩國建立正式外交關係。

28 陳威臣，〈「日韓貿易戰」的爆氣時機？日本為何強硬突襲〉，《轉角國際》，2019年7月11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922881〉。

祕密情報保護協定》(General Security of Military Information Agreement, 以下簡稱 GSOMIA)。但是,在美國川普政府強調韓美日安保合作機制重要性的強大壓力下,韓國政府以與日本重新討論出口限制措施的局長級磋商為條件,決定「停止通報協定終止效力,停止向WTO提起訴訟程序」。²⁹

日韓貿易戰迄今已逾兩年,總體而言,日本的出口限制取得短期外交成果,通過加強出口限制,阻止韓國大法院履行判決。但長期而言,反而讓懸而未決的兩國爭端更加複雜化,在外交和經濟兩方面均形成戰略性誤判而導致更大損失。

首先,從經貿角度觀察,日本對出口南韓的3種半導體材料管制,令南韓科技產業陷入材料來源斷貨危機。惟南韓許多業者也投資日本廠商,所以當南韓受制於日本原料管制,以致無法正常生產及出貨之同時,也將間接影響到日本在南韓的投資無法獲得回收,而兩國許多技術領域是互補互存關係,故若任何一方使用特定的零組件和材料作為制裁武器,將使兩國的相關產業最終可能陷入癱瘓。短期而言,南韓的應對措施是尋找替代供應鏈,

以降低貿易衝擊,故短期受益者將是中國、台灣或歐美的材料商。但長期而言,日本出口禁令甚至導致代工、封測等南韓在全球相關供應鏈整個受到影響,導致最後的終端產品無法正常出貨。³⁰此外,出口限制反而使韓國相關產業加快進行「去日本化」的產業革新進度,同樣的也對日本對韓出口之企業形成巨大財損壓力,其結果是兩國企業透過經由第三國的方式擴大了合作空間。³¹

其次,基於應對朝核威脅的需要,韓日兩國政府在2016年北韓第四次核試驗後簽訂GSOMIA。日本可向韓國提供5顆情報收集衛星、6艘神盾艦、4架地面雷達、17架預警機、77架海上巡邏機等通過尖端監視偵察資產收集的高級情報。韓國則可通過脫北者或朝中邊境地區的人員情報、軍事分界線一帶的監聽手段等收集的對朝情報與日本共用。韓日兩國可以相互提供不足的情報,提高應對北韓軍事威脅的能力,由此來看,GSOMIA的軍事價值非常高。³²另外,對美國而言,GSOMIA是美日韓聯手牽制北韓和中共之軍事協議,對美軍在東亞地區之作戰極具意義。³³

29 이강경, 설현주, 〈한일 GSOMIA의 군사적 함의 고찰〉, 《국방연구》, 제63권 제1호, 2020년 3월, P.62.

30 Yoon Young-sil, "Japanese Investors Hold More than 5% Stake in 34 S. Korean Listed Firms", Business Korea, July 10, 2019. 〈<http://www.business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3743>〉.

31 김양희, 《일본의 對韓 수출규제 강화 2년의 평가와 과제》(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구소, 2021년 8월 13일), P.95.

32 이강경, 설현주, 〈한일 GSOMIA의 군사적 함의 고찰〉, 《국방연구》, 제63권 제1호, 2020년 3월, P.72-75.

33 楊鈞池, 〈南韓陷入「歐亞構想」與「GSOMIA」的矛盾情勢〉, 2019年12月13日, 《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 〈<https://www.npf.org.tw/1/21992>〉。

歷來韓國國內在推進韓日GSOMIA簽署過程中引起最大的爭論點大致有三：第一，GSOMIA的簽署，有可能促使正在推進普通國家化的日本軍事大國化。此外，日本在人造衛星和雷達等尖端傳感器領域比韓國擁有壓倒性的技術優勢，故引發韓國對北韓情報部署可能受到日本左右之疑慮。第二，擔心韓日GSOMIA在緊急情況下，可能成為日軍進軍朝鮮半島之藉口。目前韓國的戰時作戰控制權由美軍行使，當朝鮮半島發生緊急情況時，日本根據美軍的要求派遣自衛隊進入半島恐將成為現實。第三，韓國擔心被美國納入美國主導的導彈防禦系統(Missile Defense, MD)。韓國很有可能向美國和日本提供中國和北韓的彈道導彈情報或參與攔截作戰，其結果是韓國將直接面臨中國的軍事威脅，國家利益將受到嚴重損害。³⁴

2019年8月22日，韓方面指稱，因日本以缺乏互信及安全疑慮對韓國採取經濟報復，硬是將歷史問題與安全問題掛鉤，韓國當然不得不重新審視對日的軍事情報協定，並宣布終止GSOMIA。嗣後，由於來自美國的強大壓力³⁵，由韓國青瓦台國家安保室第一次長金有根代表宣布，在隨時可以終止GSOMIA的效力為前提下，

暫停GSOMIA的取消通知。不過，美國一味向韓國施壓，而完全沒有批評日本，似乎是在某種程度上認同了日本對韓國的貿易制裁措施是出於安全保障目的，亦同意日本暗示出口韓國的一部分產品可能流向北韓之說法。因此，韓國方面雖然迴避了GSOMIA爭端，但其對日本怒火未消，日韓關係真正改善的路途尚且遙遠。³⁶

四、韓日民眾之相互認識

除了以國家為行為主體的研究對象外，適當考察兩國民眾對彼此之認識，亦有助於掌握對相對方政府外交政策之形成。在韓國東亞研究院(EAI)和日本言論NPO於2020年9月共同實施的韓日國民相互認識調查結果顯示下列五個特點³⁷：

第一，韓國的對日輿論急劇下降。過去5年間持續上升的對日好感度下降了近20個百分點(31.7%→12.3%)，非好感度增加了近22個百分點(49.9%→71.6%)，而20歲與30歲這兩世代主導了此種趨勢。其中，最大的因素是2019年7月當時安倍政府宣布對3個半導體原料進行出口限制。然而，半導體產業是韓國經濟的生命線，是戰略性產業，因此針對此一目標的出口限制可說是動搖韓國根基的措施，韓國政府強烈反對，甚至將此定性為「經濟掠

34 이강경, 설현주, 〈한일GSOMIA의 군사적 합의 고찰〉, 《국방연구》, 제63권 제1호, 2020년3월, P.75-76.

35 包括美國國防部2019年8月22日發表聲明指出，對文在寅政府的決定表示強烈的憂慮和失望。美國國防部長埃斯珀2019年11月13日起訪問韓國，在訪問韓國前他向同行的記者們稱，GSOMIA「必須維持」。

36 楚良一，〈韓國忍氣吞聲避免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失效〉，《法廣》，2019年11月27日，〈<https://reurl.cc/52OnQM>〉。

37 손열, 〈여론조사로 보는 위기의 한일관계: 국민은 변화를 원한다〉, 《EAI 이슈브리핑》, 2020년10월22일, P.1-12.

奪」。另外，在大法院強制動員判決和出口限制措施過程中，安倍曾反覆指責「韓國是不遵守承諾的國家」、「法律支配不通用的國家」、「不可信賴的國家」。兩國邦交正常化以來，日本政府領導人曾批評過韓國政府的政策和態度，但譴責韓國的國家認同感尚屬首次。另在韓國，對前首相安倍的好感度僅為1.1%、非好感度則為90%。

第二，日本國民將近55.7%不滿韓國持續以歷史問題批判日本，尤其不解韓國人的情緒性發言與行動(23.1%)，以及難以理解的韓式愛國行動(21.6%)。但是，大多數日本國民仍然認識到韓日關係的重要性，並支持改善關係的努力。另日本民眾對文在寅總統的印象好感度為1.5%、非好感度為49.7%。

第三，兩國國民對本國政府對對方國家的政策和態度僅約30%表示支持，顯示兩國國民對目前狀況和政策表現出相當的不滿。兩國國民對於本國對對方國家的外交政策也表現出有限的支持。日本方面，對安倍政府的對韓政策的肯定評價為29.6%，而韓國方面，對文在寅政府的對日政策的肯定評價僅為30.8%。

第四，強制動員賠償問題是目前兩國最大爭端。在韓國，選擇「根據司法部判決日本企業採取賠償措施或強制執行」的回答從2019年的58.1%驟減至36%，韓國方面出現了要求政府尋找新解決方法的輿論。在日本，回答「日本企業沒有必要跟隨違背韓日協定的強制執行」的佔

29.3%，日本輿論也對政府的原則性立場表示有限的支持。

第五，在軍事安全方面，去年一年來兩國間的信賴度下降尤為明顯。韓國人對日本的軍事威脅認識從38.3%增加到44.1%。在日本，認為兩國發生軍事糾紛的可能性增加者佔19%，認為不會發生的人從2019年的57%減少到40.9%，認為韓國應該加強韓美日安保合作的意見從2019年的66.2%減少到2020年的53.6%。

美日韓安全合作展望

一、韓國與日本安保觀之根本性

(一)韓國國家安全觀的變化

2007年以韓國國防大學向韓國國會提交的研究報告中指出，隨著後冷戰世界安保模式的變化，韓國的新安保視角應從對「依靠力量的方式」的絕對依賴發展到重視「依靠合作的方式」的綜合安保方式。例如，與主要國家共同參與地區安保合作體制-包括韓美日安保合作、六方會談、ARF、ASEAN+3、EAS、PSI等。此外，當時此報告即已預測中國在2020年將成為僅次於美國的世界第二大國，韓國的生存空間環境將包括北韓的威脅和體制不穩定、南北韓矛盾、中美兩國在內的周邊強國的勢力範圍擴大競爭、亞洲秩序變化、能源及氣候變化問題等超國家安保等爭端而處於不確定和不穩定的狀況。因此，提出了2008-2012年的短、中期國家安保目標，以及2020-2030年的中長期國家安保目標³⁸：

1.短期和中期(2008-2012)國家安保目標：在2008-2012年間重新整頓韓國的國家安保基礎，並以此為基礎確立領先中級國家(a leading middle power)的地位，努力成為機會和挑戰的分水嶺，就必須實現四大國家安保目標，包括：通過北韓體制正常化實現韓半島穩定；構建東北亞安全與經濟合作體系；加強亞洲安全秩序中的國際安全領導力；加強韓國國內安保基礎。

2.中長期(2020-2030)國家安保目標：韓國的長期國家安全目標是適應周邊局勢的變化。尤其是中國的崛起和隨之而來的美國等其它國家的應對所造成的秩序變化。其具體目標包括：建設「靈活的強國」，從世界領先的中級國家再進化；中美通過「共存—合作」關係實現東北亞穩定的制度化；促進解決世界人類安全爭議的主導國；國際安保領導力增強。

文在寅政府時期，韓國國家安保總體目標為：通過和平解決朝鮮半島完全無核化、構建兩韓之間的信賴及軍備控制等措施和平解決朝核問題，以牢固的美韓同盟為基礎加強韓國的國防力量，為朝鮮半島的持久和平穩定提供有力支撐；以韓美合作為基礎，通過區域內國家間的合作，主導性地解決朝鮮半島問題。同時，加強與印度、東盟、歐亞國家的政治和經濟合

作、地區合作制度化，並積極參與氣候變化、國際恐怖主義、傳染病、難民問題等國際社會面臨的全球安保難題；在保護國民個人財產和權益的同時，從網絡威脅、恐怖襲擊、災難、生活安全等多種威脅和危險中保護國民的安全和生命。³⁹在實現安保領域的國政目標下，具體措施為：促進南北對話、交流、協議法制化；體現「我們的國防由我們自己負責」的責任國防，通過早期轉換作戰指揮權，建構韓國軍隊主導的新聯合防衛體系；在加強與周邊四國的合作的同時，將推進向東協、歐洲、中東、非洲等擴展合作外延的均衡合作外交，包括：新南方政策是與東協10國及印度在政治、經濟、文化、人力交流等方面，加強友好合作的外交政策；新北方政策是將朝鮮半島與俄羅斯、中國、蒙古、中亞國家等北方歐亞國家間的交通、物流及能源基礎設施連接起來，創造韓國經濟的新增長動力，並在追求共同繁榮的同時，為包括朝鮮半島在內的歐亞大陸的和平穩定而制定的政策⁴⁰。

在對日的安全情勢認識上，韓國2020年《國防白皮書》對於日本的敘述從2018年的「夥伴」一詞降格為「鄰國」，並指摘日本政治領導人挑釁獨島問題、日本巡邏機接近威脅飛行，並單方面發表言論混淆視聽，導致兩國國防關係陷入僵

38 최중철, 서동주, 이대우, 장계순, 정규섭, 최운도, 《21세기 한국의 국가안보전략》, (정책연구용역과제 연구보고서, 2007년도, 국회 국방위원회), P.v- xi.

39 《국방백서2020》, (국방부), P.35.

40 《국방백서2020》, (국방부), P.36.

局⁴¹。反觀日本則在2020年7月的《2020年防衛白皮書》中，日本第四度提及澳大利亞、印度、東協為日本的安保合作對象國，刻意貶低韓國的重要性。此外，此次白皮書中並未提到「北韓是敵人」，而是概括性地規定「韓國軍隊把威脅和侵害大韓民國主權、國土、國民、財產的勢力視為我們的敵人」。對此，韓國國防部表示，此係「保留2018年國防白皮書的內容，不僅包括北韓的威脅，還包含潛在威脅、超國家、非軍事威脅。」⁴²

朝鮮半島的地區安全因素中，最大的變化是美中競爭的深化。中國的崛起強化了美國對中國的牽制。最近，隨著中國崛起到威脅地區霸權的程度，美國不分黨派，正在實施對中國的封鎖政策。韓國被迫在安保同盟夥伴美國、最大貿易國中國之間做出選擇。此前，文在寅政府在美中對決格局中，保持模糊的立場。

據調查，隨著朝核威脅高度化，朝美無核化對話沒有取得成果，認為北韓是安保威脅的韓國人佔55.8%。這對長期目睹北韓武力挑釁和核武器開發的韓國人認為北韓是第一威脅是理所當然的。除北韓之外，選擇中國的比率為25.9%、日本11.3%、美國6.1%。而假設「統一

後」(排除北韓因素)，韓國人認為中國是最大的安保威脅者，達到66.7%，日本則是佔23.1%。關於周邊國家對韓國的負面影響力。2020年，大部分回答對韓國產生負面影響力者，日本佔71.5%、北韓佔68.9%、中國佔66.3%、俄羅斯佔55.4%。唯一認為美國對韓國有正面影響的人佔63.6%，佔多數(否定：17.6%)。⁴³

拜登政府上臺後，雖然強調韓美日合作，但對改善韓日關係的前景並不樂觀。在2020年的調查中，71.5%的人認為日本對韓國產生負面影響。此數據比之前被稱為「現在」、「統一後」安全威脅的北韓和中國還要高，但並非出於安保威脅。實際上，認為日本是安全威脅的韓國人目前為11.3%，統一後為23.1%。在假設「統一後」的情況下，將日本視為安全威脅的比率增加了11.8個百分點，遠不及被認為是最大安全威脅的北韓和中國。顯然，韓國人的對日認識似乎與國家的認同感有關。⁴⁴

(二)日本國家安全觀之變化

明治維新到二戰結束前，日本的國家安全觀是以軍國主義為主軸，以1890年山縣有朋的「大陸政策」⁴⁵主張為理論基礎，也就是「主權線」與「利益線」。防

41 〈백서의 대결...韓 국방백서 vs 日 방위백서〉,《연합뉴스》,2021년2월6일,〈<https://reurl.cc/GbnXMd>〉.

42 박병수,〈2020년 국방백서, '일본은 동반자' 삭제, '이웃국가'로만 표기〉,2021년2월2일,《한겨레》,〈<https://reurl.cc/emMWqR>〉.

43 제임스 김, 강충구, 함건희,〈한국인의 외교안보 인식: 2010~2020년 아산연례조사 결과〉,2021년9월,P.7-9.《아산정책연구원》,〈<https://reurl.cc/q1GZAY>〉.

44 제임스 김, 강충구, 함건희,〈한국인의 외교안보 인식: 2010~2020년 아산연례조사 결과〉,2021년9월,P.47.《아산정책연구원》,〈<https://reurl.cc/q1GZAY>〉.

45 於下頁。

衛領土為「主權線」，與主權線有利益相關者稱為「利益線」，一旦失去「利益線」，「主權線」就會受到威脅。山縣有朋認為日本的疆域為「主權線」，鄰國朝鮮、中國是日本的「利益線」，日本僅僅防守主權線已不足以維護國家的獨立，必須進一步保衛利益線。他的意見為日本侵略的計畫製造了理論根據，成為後續日本發動甲午戰爭、日俄戰爭的理論基礎⁴⁶。

二戰之後，因為美國需要以日本擔任支援韓戰的前進基地，日本被動的接受了美式的戰後改造，確立了「日美基軸」和「經濟外交」為兩大支柱的戰後外交關係。此時，「脫亞入美」是日本的理念基礎，「經濟崛起」是日本的價值追求。吉田茂政府選擇與美國結盟，簽訂《美日安保條約》，實行重經濟、輕武裝的國家發展戰略。⁴⁷日本在70年代受到石油危機跟「尼克森衝擊」影響⁴⁸，經濟發展與中日關係發展的基礎上，確立了新的戰略目標-「從經濟大國走向政治大國」，基本外交理念是「入美入亞」，手段是展開

平衡外交，推動「日美關係對等化」和「對美、對亞關係平衡化」，以及「日美歐三極論」、「日美關係和日中關係同等重要」。⁴⁹冷戰後，由於蘇聯體制的瓦解，使得「美日安保條約」的合理性與必要性受到了質疑，此時從日本商界到大眾傳媒呼籲日本要「脫美入亞」⁵⁰，此時中國已經因為改革開放政策改變了國家的根本體質，綜合國力大幅增長。對日本而言，當時的中國是相當陌生的。因此，在日本「脫美入亞」的同時，在日本也興起了「中國威脅論」，畏懼中國的現代化，認為中國的崛起對日本而言是阻礙了日本成為政治大國的絆腳石，將中國視為東亞區域霸權的威脅者。冷戰的結束亦使日本的防衛假想敵從蘇聯轉向中國與其血盟北韓。

東京都知事石原慎太郎與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可以說是推動日本正常國家化的右翼保守派代表性人物。石原慎太郎發表了一系列「日本可以說NO」的主張，他批評美國對日本懷有種族歧視，使日本居

45 大陸政策可以追溯到豐臣秀吉(1537-1598年)時期。豐臣秀吉統一日本後，積極以軍事力量在亞洲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大帝國，並且先後在1592年(壬辰倭亂)、1957年(丁酉再亂)發動兩次侵略朝鮮的戰爭。

46 孫葉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安全觀的形成與演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頁49-51。

47 仲秋，張玉國，〈戰後日本安全觀的延續與發展〉，《日本學論壇》，2008年第4期，頁80。

48 「尼克森衝擊」是指美國總統尼克森在外交、經濟政策上的重大調整，對日本政治、社會形成的衝擊。例如，1971年美國總統尼克森宣布新經濟政策，凍結工資和物價，對進口商品徵收10%的關稅，暫停黃金和美元的兌換，對日本經濟造成重大打擊。另外還有1971年尼克森對華政策的重大轉向，也讓日本政府措手不及。

49 金熙德，〈21世紀日本對美、對亞外交的抉擇〉，《變化中的東亞與美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頁134。

50 卓南生，《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頁467-472。

於從屬的地位。無論是美日同盟的軍事分工到兩國貿易摩擦，都是美國對日本懷有歧視的例子。他主張日本人應該要發展獨立的自我意識，不要再對美國唯命是從。石原慎太郎對於中國的評價更是負面。1973年石原為了抗議首相田中角榮與中國建交而組織了「青嵐會」，強力阻擋「日中航權協定」，甚至表示「南京大屠殺是中國捏造的謊言」，隨後更改歷史教科書，參拜靖國神社等，並認為中國企圖在亞洲拓張帝國，是最大的威脅⁵¹。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的外交和安保政策與石原慎太郎的思考模式相似，他強調「積極和平主義」，表示日本如果不對世界和平與安定積極負起責任，「則無法保護日本自身的和平」。⁵² 安倍的外交安保政策最大的突破點是集體自衛權解禁。他成功地利用中日釣魚島爭議與衝突，向國際宣揚中國威脅的具體存在，在2013年度出版的《防衛白書》及《國家安全保障戰略》中也強調中國不透明的軍事發展提升了區域的緊張。在2014年7月1日通過了「行使集體自衛權的憲法解釋」的決議案，並且提出新的「武力行使三條件」：(1)日本遭到武力攻擊，或與日本關係密切國家遭到武力攻擊，威脅到日本的存亡，從根本上對日本國民的生命、自由和追求幸福的權利構成明確危險；(2)

為保護國家和國民，沒有其他適當手段可以排除上述攻擊；(3)武力行使限於「必要最小限度」。從這個憲法解釋案可看到安倍政府將日本從「專守防衛」的外交安保政策轉向成為具有軍事攻擊性、可以戰爭的國家。不僅如此，凡是日本主觀上認為會威脅到日本本土或是與它關係密切的國家的安全時，日本就能行使武力。此政策路線即是與第二次大戰日本發動侵略戰爭前的安全觀思想軸心——「主權線」與「利益線」相同。

二、韓日關係對構建美日韓三角安保合作之影響

美日韓三方並無直接同盟關係，而是以美國為核心領導，分別簽訂《美韓共同防禦條約》與《美日安保條約》。《美韓共同防禦條約》的核心原則是韓美任何一方在亞太地區受到攻擊，另一方都給予軍事援助；《美日安保條約》的核心內容則是雙方同意需共同承擔維持和發展抵抗軍事攻擊能力的義務，若是在日本管制的領土上受到軍事攻擊，雙方將相互協助。不過，受限於日本憲法第9條之規定，日本無法派遣軍事部隊至海外協防美國。由此看來，美韓同盟與美日同盟在權利義務上具有不對稱的特點。

美韓同盟和美日同盟有很多共同點及差異性。例如，雖然美日同盟很大的目

51 莊雅涵，〈妾身未明？石原慎太郎的世界觀與"中國"論〉，《國家發展研究》，第7卷第2期，2008年，頁42-51。

52 北岡伸一，〈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日本網》，2014年4月22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的是共同應對中國威脅，也包括應對朝核問題，但美韓同盟主要以抑制對北韓的戰爭為主。美韓同盟雖然雙方國力差異甚大，但仍是以前國家間對等性為基礎所締結的，而美日同盟是太平洋戰爭的戰勝國和戰敗國之間締結的，其扈從性更大。從美國的立場來看，也會對美日同盟和美韓同盟的用途有不同的認識。但從根本上而言，這兩個同盟是以美國這個強國為中心的不對稱同盟，因此具有共同性，即根據韓國和日本的自主性讓步程度決定美國安保支援強度。

但是，最近韓國和日本的對於同盟自主性認識和處理方式出現了差異。韓國得益於國力增強，出現了要求收回戰時作戰指揮權等加強自主性的傾向。正如前述，韓國在國家安全觀意識上轉變思維，致力建立「我們的國防由我們自己負責」的責任國防，以提升自主性。反之，雖然日本的國力比韓國更強大，但日本並沒有像韓國那樣露骨地要求擴大自主性。如果說來自大國的安保支援中最重要的事項是，當弱小國家陷入戰爭等極端危機時能夠迅速、強有力的提供支援的話，那麼迄今為止韓國推進的自主性擴大措施可能正在削弱美國的安保支援程度。

韓日關係究竟會否影響美日韓三方同盟的構建，答案恐怕是既肯定但又非絕對。

首先，韓日間迄今並未有正式的軍

事同盟協定，但基於防禦朝核的共同利益，兩國簽訂GSOMIA以即時分享朝核情報，但從之前兩國關係的持續惡化，文在寅不惜撕毀該協定，也要在民族屈辱、領土爭議等遺留的問題上與日本對抗，雖然在美方調解下「暫緩」廢止該規定，但韓國對日本的國仇家恨情緒早已表露無遺。正如前文所述，韓國人對日本的軍事威脅認識從38.3%增加到44.1%。而在日本，認為兩國發生軍事糾紛的可能性亦有所提高，認為韓國應該加強韓美日安保合作的意見從2019年的66.2%減少到2020年的53.6%。顯見受到兩國關係惡化的影響，兩國維繫類軍事同盟協定之穩定性與意願大幅下降，而兩國民眾的相互軍事威脅之認識正在提高，對於韓美日安保合作的期待性亦大幅下降。

其次，文在寅政府上任後欲推動「新北方政策」及「新南方政策」。「新北方政策」旨在打造朝鮮半島(南北韓)及俄羅斯遠東地區，再擴及至蒙古與中亞的經濟合作圈，「新南方政策」則是要與東南亞共建人人互助，心心相通的「人民(People)共同體」、共保安全維持和平亞洲的「和平(Peace)」共同體、經濟互惠利益共用的「繁榮(Prosperity)共同體的原則上，與第二大貿易夥伴東協的合作關係由「戰略夥伴」全面升級為「共同體」水準，讓雙邊交流普遍惠及兩地人民⁵³。此外，文在寅再於2019年12月23日訪中時會

53 國際中心，〈南韓也要新南向！文在寅提出「新南方政策」要和東南亞成為「3P共同體」〉，2017年11月14日，《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358348>〉。

見習近平時表示，韓方希進一步擴大中韓兩國經貿、文化、體育、環保等領域合作，推動「一帶一路」倡議與韓國「新北方、新南方政策」銜接，加速推動聯合開拓協力廠商市場合作。⁵⁴在文在寅的「新北方政策」及「新南方政策」中，中國、俄羅斯及北韓分別扮演著關鍵角色，韓國企圖與這些國家緊密合作，在價值觀與安保戰略上即與美日亟欲推動以封鎖中國為核心的「印太戰略」相違背。

第三，美日韓在印太戰略問題上存在認知與作法上的巨大差異。2021年美日外交國防2+2會談共同聲明中抨擊中國行為違背現存國際秩序，但基於戰略價值的考量，韓國在2021年韓美外交國防2+2會談的共同聲明中並未提及中國，僅強調「由於區域安全環境挑戰漸增，美韓同盟的共同價值強化了兩國致力於反對損害和削弱基於規則的國際秩序的所有行為」，⁵⁵且仍未宣布加入四方會談(QUAD+)，並強調「通過與韓國新南方政策的連接合作，為打造自由開放的印太地區而合作」⁵⁶，顯然韓國並不想因受到以圍堵中國為主的印太戰略所「牽連」，導致未來可能獨自面對中國的制裁，或阻礙其國家戰略發展，而陷入「新同盟困境」之中，並以「新南方政策」的外交經濟發展戰略來與

「印度－太平洋地區」域內所有國家間共同合作發展，而非以圍堵中國的前提下加入印太戰略，以滿足「兩面結盟」的方式來應對美中競爭局勢。簡而言之，面對印太問題，韓國將其視為「地區」的連結，而非「意識形態」的連結。從這個角度來看，美日韓在印太地區的合作，美日間偏向於圍堵中國的安保合作，美韓間則因韓國的國家利益考量，而選擇以經濟合作方式來整合，韓日關係對此議題的影響性即較不顯著。

結語

本文認為，韓日關係惡化無疑是阻礙建構美日韓三方直接同盟的主要因素，但由於朝核威脅，韓國一方面無法忽略韓中高度經濟聯繫性且需要中國在朝鮮半島發揮積極作用等因素，故無法像日本一樣站在對中牽制的第一線，但另一方面韓國仍需要美國核保護傘的延伸威懾承諾，故必須維繫美韓同盟穩定發展，而與日本僅是在美國主導下形成間接同盟的架構。在韓日歷史、領土問題尚未完全解決之際，且在兩國對國家利益定義迥異之情況下，若無美國中間調和，韓日難以建立真正直接的同盟，能在美國主導下得以延續 GSOMIA 的有效性恐怕已是兩國同盟合作

54 鉅亨網，〈文在寅赴中國：強化中韓雙邊合作、強調香港與新疆屬中國內政〉，2019年12月23日，〈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3555>〉。

55 黎堡，〈美韓結束2加2會談聯合聲明未點名中國〉，2021年3月18日，〈美國之音〉，〈<https://reurl.cc/dxQeRq>〉。

56 김도희, 〈한미 외교·국방장관(2+2) 회의의 주요 내용과 쟁점 및 과제〉, 2021년4월2일, P.12. 〈국회입법조사처〉, 〈<https://reurl.cc/0xK67k>〉。

的最大限度。況且，韓國總統文在寅2021年5月21日赴美與拜登領袖會談後，美韓同盟的層次已提高到超越軍事同盟，跨越到「共用價值的責任同盟」，其合作範圍超越朝鮮半島，擴及至全球領域，合作領域亦已跨域軍事，擴及到商貿與科技，乃至於太空事業，恐怕日本並不在韓國提升與美同盟關係的結構要素之中。

影響韓日關係發展的重大事件，如日軍慰安婦、獨島主權、日企強徵工、貿易戰等爭端，並非一日之寒，在文在寅政府強調「和朝友中」政策及歷史屈辱等多重民族情緒下，韓國對日採取強硬不友善政策並不令人意外，而韓國民眾對日負面情緒正提供了韓國政府最有力的支撐。美國的居間斡旋可說是韓日關係的潤滑劑，但目前並無顯著得以緊密黏著兩國關係的共同利益存在，畢竟在金正恩宣示「北韓的主要敵人是戰爭本身，而不是南朝鮮或美國等特定國家的勢力」⁵⁷之下，對於一向秉持友朝立場且並未將北韓列入敵國的韓國而言，朝向良善發展方向的南北韓關係意味著與日建立或維持「同盟關係」並非首要及必要課題。

在以圍堵中國為目的之美日印太戰略上，日本基於國家利益頻對美國「表忠心」，韓國則深怕被捲入一場不必要的戰爭，而自始採取模糊戰略，在利益方向及行動不一致之情況下，美日韓同盟結構自當呈現穩定性不足之情況。美國深知韓日

兩國在印度太平洋地區不同的戰略利益與顧忌，對兩國採取角色與功能區別策略，此在美韓2+2外交國防部長會議中未直接點名批判中國，僅強調在朝核問題上之合作即可見一斑。總而言之，韓日兩國基於歷史情仇、領土爭端，以及國家發展安全觀的價值理念不同等因素，要建立與維繫名符其實的同盟關係本非易事，而朝核威脅程度及韓國對朝政策方為韓日關係離合要因，中國問題則為美日韓建構三方同盟的核心關鍵。

參考文獻

一、中文文獻

(一)專書

- 1.卓南生，《卓南生日本時論文集—日本社會》，(北京：世界知識出版社，2006年)。
- 2.尚書，《美日關係同盟走向》(北京：時事出版社，2009年)。
- 3.林宗達，《國際關係理論概論—現實主義與自由主義的相關理論(二版)》(臺北：經典文化，2016年)。
- 4.孫葉青，《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日本安全觀的形成與演變》，(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年)。
- 5.張亞中、張登及，《國際關係總論(第五版)》(臺北：揚智文化，2020年)。
- 6.Jon C Pevehouse • Joshua S. Goldstein著，歐信宏、胡祖慶譯，《國際關係(四版)》(International Relations 11E)(臺北：雙葉書

57 김동현, 〈조선신보 "북, 국방력 발전에 족쇄 채운 이종기군 제거 주력"〉, 2021년10월29일, 《연합뉴스》,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1029049500504?section=nk/news/all>〉.

廊，2017年)。

(二)期刊論文

- 1.于鐵軍，〈國際政治中的同盟理論：進展與爭論〉，《歐洲研究》，1999年第5期。
- 2.仲秋，張玉國，〈戰後日本安全觀的延續與發展〉，《日本學論壇》，2008年第4期。
- 3.金熙德，〈21世紀日本對美、對亞外交的抉擇〉，《變化中的東亞與美國》，(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0年)。
- 4.莊雅涵，〈妾身未明？石原慎太郎的世界觀與"中國"論〉，《國家發展研究》，第7卷第2期，2008年。
- 5.趙可金，〈軍事同盟及其生命力問題〉，《太平洋學報》，2005年第4期。

二、外文著作

(一)專書

- 1.김양희, 《일본의 對韓 수출규제 강화 2년의 평가와 과제》, (국립외교원 외교안보연구소, 2021년 8월 13일).
- 2.대한민국국방부, 《국방백서 2020》
- 3.최종철, 서동주, 이대우, 장계순, 정규섭, 최운도, 《21세기 한국의 국가안보전략》, (정책연구용역과제 연구보고서, 2007년도, 국회국방위원회).
- 4.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 문제합의 검토 태스크포스, 《한·일 일본군위안부피해자문제합의(2015.12. 28.) 검토결과보고서》, 2017년 12월 27일.

(二)期刊論文

- 1.손열, 〈여론조사로 보는 위기의 한일관계: 국민은 변화를 원한다〉, 《EAI 이슈브리

핑》, 2020년 10월 22일.

- 2.양기호, 〈강제징용 문제와 한일관계: 타협의 돌파구는 없는가〉, 《정책논쟁》, 제 144호, 2020년 8월 11일.
- 3.윤석정, 〈청년세대(MZ세대)와 일본군 '위안부' 문제〉, 《[EAI 워킹페이퍼] 한일관계세대분석_역사》, 2020년 8월 11일.
- 4.이강경, 설현주, 〈한일 GSOMIA의 군사적 합의 고찰〉, 《국방연구》, 제 63권 제 1호, 2020년 3월.
- 5.이강경, 설현주, 〈한일 GSOMIA의 군사적 합의 고찰〉, 《국방연구》, 제 63권 제 1호, 2020년 3월.
- 6.조진구, 〈문재인정부의 대일 정책-일본군위안부문제를 중심으로〉, 《한일민족문제연구》, 36권 0호, 2019년 06월.

三、網路資料

(一)中文

- 1.北岡伸一, 〈轉向「積極和平主義」的日本安全保障政策〉, 《日本網》, 2014年 4月 22日。〈<http://www.nippon.com/hk/currents/d00108/>〉。
- 2.何思慎, 〈日、韓「慰安婦問題」中的外交、歷史與人道〉, 《海峽評論》, 2016年 2月 號(302期), 〈<https://haixia-info.com/articles/7783.html>〉。
- 3.何映萱, 〈MZ世代！南韓企業社內課向年輕人取經〉, 《TVBS新聞網》, 2021年 5月 7日, 〈https://news.tvbs.com.tw/focus/1505442?from=Copy_content〉
- 4.鉅亨網, 〈文在寅赴中國：強化中韓雙邊合作、強調香港與新疆屬中國內政〉,

- 2019年12月23日,《財訊》,〈<https://www.wealth.com.tw/home/articles/23555>〉。
 5. 國際中心,〈南韓也要新南向!文在寅提出「新南方政策」要和東南亞成為「3P共同體」〉,2017年11月14日,《風傳媒》,〈<https://www.storm.mg/article/358348>〉。
 6. 陳威臣,〈「日韓貿易戰」的爆氣時機?日本為何強硬突襲〉,《轉角國際》,2019年7月11日,〈https://global.udn.com/global_vision/story/8663/3922881〉。
 7. 陳剛華,〈韓日獨島(竹島)之爭與美國的關係〉,《學術探索》,2008年第4期。
 8. 楊鈞池,〈南韓陷入「歐亞構想」與「GSOMIA」的矛盾情勢〉,2019年12月13日,《國家政策研究基金會》,〈<https://www.npf.org.tw/1/21992>〉。
 9. 楚良一,〈韓國忍氣吞聲避免日韓《軍事情報保護協定》失效〉,《法廣》,2019年11月27日,〈<https://reurl.cc/52OnQM>〉。
 10. 黎堡,〈美韓結束2加2會談聯合聲明未點名中國〉,2021.3.18,《美國之音》,〈<https://reurl.cc/dxQeRq>〉。
 11. 戴正、鄭先武,〈同盟理論的演進過程——兼論其對中國國際關係理念的鏡鑒作用〉,《廣西社會科學》,2020年第1期,《中國社會科學網》,〈http://www.cssn.cn/gjgxx/gj_gjgxl/202002/t20200217_5089275.shtml〉。
 12. 觀察者網,〈韓國6名議員登爭議島嶼日政府:極為遺憾〉,《新浪新聞》,2019年8月31日,〈<https://news.sina.com.cn/o/2019-08-31/doc-iicezueu2485369.shtml>〉。
- (二)外文
1. Yoon Young-sil, "Japanese Investors Hold More than 5% Stake in 34 S. Korean Listed Firms", Business Korea, July 10, 2019. 〈<http://www.businesskorea.co.kr/news/articleView.html?idxno=33743>〉
 2. 〈백서의 대결...韓 국방백서 vs 日 방위백서〉,《연합뉴스》,2021년2월6일,〈<https://reurl.cc/GbnXMd>〉。
 3. 김도희,〈한미 외교·국방장관(2+2) 회의의 주요 내용과 쟁점 및 과제〉,2021년4월2일,P.12.《국회입법조사처》,〈<https://reurl.cc/0xK67k>〉。
 4. 김동현,〈조선신보 "북, 국방력 발전에 족쇄 채운 이중기준 제거 주력"〉,2021년10월29일,《연합뉴스》,〈<https://www.yna.co.kr/view/AKR20211029049500504?section=nk/news/all>〉
 5. 문재인,〈위안부 TF 조사 결과에 대한 대통령 입장문〉,《청와대》,2017년12월28일,〈<https://www1.president.go.kr/articles/1915>〉。
 6. 박명수,〈2020년 국방백서, '일본은 동반자' 삭제, '이웃국가'로만 표기〉,2021년2월2일,《한겨레》,〈<https://reurl.cc/emMWqR>〉。
 7. 손덕호,〈日 교과서, '중군 위안부' → '위안부' 수정...외교부 "매우유감"〉,《조선일보》,2021년9월10일,〈<https://biz>



chosun.com/policy/politics/2021/09/10/6FOKONQWK5FKVNPQ72E5OGLTYQ/〉.

8. 이제훈, 〈한·일, 위안부문제 해결 합의… “군관여 여성에 상처”〉, 《한겨레》, 2015년 12월 28일, 〈<https://www.hani.co.kr/arti/politics/diplomacy/723743.html>〉.
9. 제임스 김, 강충구, 함건희, 〈한국인의 외교안보 인식: 2010~2020년 아산연례조사 결과〉, 2021년 9월, 《아산정책연구원》, 〈<https://reurl.cc/q1GZAY>〉.

10. 조준형, 〈박근혜정부'위안부이면 합의' 숨겼다…"합의비공개부분존재"〉, 《연합뉴스》, 2017년 12월 27일, 〈<https://www.yna.co.kr/view/AKR20171227088400014>〉.

作者簡介

馬依翔中校，國立臺灣師範大學東亞系博士候選人、世新大學法律系碩士、韓國延世大學區域問題研究所碩士、空軍官校正期90年班。



S-70C型救護直升機(照片提供：葉秀斌)